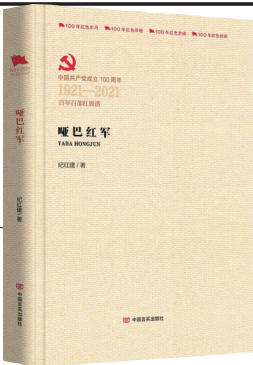




平凡中见伟大

——读《哑巴红军》



《忘记我》

《哑巴红军》发表于2006年第7期《中国作家》，随后《作家文摘》等全国五十余家报刊转载，在全国引起较为强烈反响，《人民日报》《文艺报》进行专门评论，并获“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解放军文艺优秀作品奖等。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2021年3月中国言实出版社将《哑巴红军》列入“百年百部红旗谱”单行出版。

这位特殊的老红军是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唯一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聋哑红军。他既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红军，又是一个身份特殊的红军，他不会说话，更不识字，甚至不懂哑语，只会用简单的手势表达自己的心思。在档案里，他的姓名是“哑巴”，出生年月不详，入伍时30岁左右，籍贯只知道是四川一带，其他的具体内容都不详，唯有入伍年月明了：1935年6月。他是红一方面军途经四川时，红军战士误把他当作奸细而戏剧性地被带上革命道路的，并且机缘巧合地成为保卫党中央、中央军委的贴身警卫部队——中央警卫团炊事班的一名挑夫，红色奇缘由此演绎。他跟随着主力部队，从大渡河到延安，从延安到西柏坡，从西柏坡到北京香山，再从香山来到北京城内，从背行军锅到喂马、挑水、烧火，再到看管果园，他的身份以及他所做的每一项工作都十分普通，甚至普通得不为人所关注。

中央红军过了大渡河后，政治保卫大队的战士肖士杰与马天皇发现这位特殊同志时，曾与他有过一段时间的对峙。在那场对峙中，他丝毫不胆怯，分得清好与坏、是与非，而再一次让肖士杰与马天皇吃惊的是，面对他俩黑洞洞的枪口，他居然毫无惧色。虽然在这里他与肖士杰和马天皇似乎结仇，但在后来的战争洗礼中，坚贞的革命信念让他们走到了一起，成为了同甘共苦的革命战友。这位特殊同志正式被批准参加红军

后，对革命充满了向往，并渐渐构筑着坚定的信念，如他看到灰色粗布中山装、八角帽、缀布质红五星帽徽和红领巾章时，左看看右看看，前摸摸后摸摸，感觉特别亲切，久久不愿放手。

这位特殊同志是有一些缺点和小毛病的人，比如脾气暴躁、用唾沫表达自己的不满等，这些小毛病几乎贯穿了作品的始终。这些对主人公小毛病的描写不仅没有让读者怀疑主人公的品质，反而是体现了鲜明的人物个性、可敬可佩的高尚品质，让我们更加敬重这个从大渡河走来的红军战士。当年在大渡河被肖士杰和马天皇他们带回大队的时候，这位特殊同志就对别人对他的轻视给予了回击，他不会说，就吐唾沫。新中国成立后，这位特殊同志因生病，领导想让他去休养，但领导知道如果说要他去休养，他肯定不会去，于是编了一个美丽的谎言，说让他去一个荣军院，负责那里的卫生。但来到荣军院后，他对于那些摆架子、到处乱扔垃圾的从战场上退下来的英雄，也会纠正他们的缺点，要是他们不改，逼急了，他也朝他们吐唾沫。这一小毛病直到他去世都一直保持着。正是这些小毛病，他与许多人闹过矛盾。

这位特殊同志的手特别紧，在延安的时候，他把几块银元放在布口袋里，贴身放着，生怕丢了，或是被人偷了。当时与他一起的战友熊健心里还产生一个疑问：他怎么把钱看得这么重呢？自己舍不得花，是不是他老家还有老婆孩子啊？要么就是他的农民意识太强了。关于他手紧的例子还不少，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对钱看得重是事实，但他不贪钱，说得准确点，他只是爱惜钱、勤俭节约。战友要离开连队了，他送点钱；战友家里有困难了，他资助点钱。后来，当熊健离开连队时，他送给了他一块银元，这是熊健始料未及的，熊健对他的猜疑也随之消失。对比出来了，他不是抠门，而

是实实在在原汁原味的高尚。后来，他又随同部队来到北京，并在这里负责看管果园，虽然他不随便让官兵进入果园摘果子，但他经常送果子给幼儿园的孩子们吃，即使是捡回来的果子，他把好的没烂的送给战友们吃，自己却吃烂了的。高尚的品质跃然纸上，我们不得不 对这位特殊的老红军肃然起敬。

这位特殊同志的一生是幸运的，因为他遇上了红军，红军给他饭吃、衣穿，还让他干活，甚至给他发银元、发工资；随同部队到达北京后，他又得到了战友、领导甚至是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但这位特殊老红军的一生又是悲壮的，直到他去世，仍旧没有找到他的家和亲人，也没有成家。组织上也多次安排去找他的亲人，甚至在报纸上刊登了消息，前来北京认亲的人也络绎不绝，排成了长队，但没有实现；组织也想给这位特殊的老红军成个家，老来有个伴，这个过程中有不少令人发笑却动人的故事，既体现了这位特殊同志平凡的一面，也体现了他质朴高尚的一面。

这位特殊的老红军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革命，党和军队领导并没有忘记他对革命所作出的贡献，对他进行了特殊的照顾。最让人感动的是，在这位特殊的老红军病重后，师领导和师医院领导一致同意成立特殊“医疗护理小组”，让他安度晚年，这不光在卫戍区部队，就是全军都是破了例的。

该书将文字空间留给这位长征途中的“边缘人群”，定位于“平凡人物”，将笔头转向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让历史人物还原真实，在整体上做到了将历史叙事与人物描写有机地融为一体，语言质朴感人，有浓郁的乡土气息，让文学的表现空间豁然增大，鲜明地体现了一位特殊而又普通红军的质朴与伟大，呈现给人们的是真实可感的心灵图景和血肉丰满的长征战士形象。选自《学习强国》

钱秀玲，一个出身江南望族的女子，在二战期间于纳粹枪口下挽救了110名比利时人质的生命，被誉为“中国的辛德勒”，比利时国王授予她“国家英雄”勋章。她出身名门为何远赴欧洲求学，鲁汶大学双博士毕业为何隐居村落行医救人，钱氏兄妹如何联袂德国将军谱写一桩让世界惊叹的英雄壮举，当荣誉纷至沓来，她留给世间的遗言为什么是“忘记我”？著名作家徐风，历时十六年追寻这段尘封往事，以非虚构的笔法重返历史现场，还原一个时代的波诡云谲和一位女性传奇人生背后的中国精神。

作者徐风，作家，已出版《布衣壶宗》《江南繁荒录》等著述十七部。



《奥德赛博》

走在山路上，路边是繁茂的桫欏……穿过虚假的风景，穿过山沟里的废弃工厂，穿过夏夜的稻花清香，穿过嵌套的沉浸系统，穿过意识的湖面下记忆的垃圾场，穿过成串的数字0与1，穿过不再重要的人类文明，他去寻找一杯可以拉丝的醇酒。《奥德赛博》是一本独特的科幻作品集，收录中短篇小说八篇，评论三篇。其中篇幅最长的《后来的人类》原题为《奥德赛博》，期刊发表时题为《后来的故乡奥德赛》，结集成书时采用当前的篇名，并将原始的篇名作为书名。

作者糖匪，作家。出版短篇小说集《看见鲸鱼座的人》、长篇小说《无名盛宴》等。



《喜剧》：戏剧性日常性结合的当代传奇

近年来，陈彦的长篇小说《装台》《主角》，以朴素手法讲述典型“中国故事”，描摹生活和人物本身的丰富与浑厚，呈现了现实主义文学的魅力。其新近出版的“戏剧三部曲”收官之作《喜剧》既延续前两部长篇绵密、坚实的现实主义风格，又以更强的故事性和更深沉的当下思考引人注目。小说通过“喜剧”这一既传统又现代的戏剧形式，关联广阔时代生活和不同人群，塑造了贺少天、贺加贝、潘银莲、南大寿、万大莲、贺火炬等各具特色的典型形象，并对当代人的文化心理和情感结构展开书写。

《喜剧》是一部兼具“戏剧性”与“日常性”的小说。一方面，小说叙事绵密，人物和故事情节充满传奇性。小说注重通过语言、动作刻画人物，揭示人物在特定情境下的心理情感状态，尤其对人物内心的矛盾冲突有丰富细致的表现。贺少天是闻名遐迩的“大艺术家”，贺加贝、贺火炬兄弟虽然比不上父亲，但也是广有影响的丑角演员。贺加贝跌宕的命运，贺氏父子的绝活儿等，都具有不同程度的传奇性。而通过巧合、突转等艺术手法，小说的戏剧性和传奇性更是不断得到强化。另一方面，《喜剧》又注重呈现“戏剧性”背后的“日常性”，避免因人物事件的传奇而造成不真实感。作家将笔墨集中于描写平凡人物的现实人生，注重在平淡的日常生活情景中展现人的命运，揭示人物内心世界。贺氏父子的相貌、技艺和绝活儿，无疑具有一定传奇性，但作家通过鲜活的生活画面和平常的人际关系讲述，自然而然地写他们作为普通人的人生体验。

小说以饱满、厚重、细腻的笔墨描摹当今现实：通过人物的生活故事，写戏曲在当下现实中的变化；通过喜剧艺人所关联的广阔城乡和广泛人群，写当下社会生活的鲜活真实；通过人物之间的爱情、亲情、友情等，写当下



中国人的伦理道德和心理情感状况。当然，作家并不满足于日常真实感的还原，他试图超越日常、超越经验性的现实描述，进入另一个境界。比如，小说通过贺少天、潘银莲等人物进入中国人的深层情感结构。贺少天寄托着作家对喜剧之为喜剧的本性思考，小说通过他，从艺术方面证明戏剧要契合时代变迁中的中国人审美趣味。潘银莲则体现作家对喜剧的观照，小说通过她，从现实生活方面证明，喜剧要贴近中国人的生活现实和道德经验。无论生活如何变迁，喜剧如何变革，都要守持艺术之根。

《喜剧》是一部具有现实主义思想力量的小说。陈彦描写贺氏喜剧的兴衰沉浮，通过编剧、演员与观众之间的关系，揭示喜剧与时代、与具体历史情境之间的关系，展现喜剧的多种实践形态与内涵，表达对喜剧及其关联的现实生活和人性的深入思考。寓庄于谐，是

《喜剧》的基本手法，引发笑声，也带来思考，使小说贯穿着向上生长、向下探源的执着不息的精神力量。

《喜剧》借助“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力量，带领观众感受人物所处的情境，读来很有代入感。同时，小说没有沉溺于人物的心理、情感，而是由内心向外延伸、辐射，走向广阔的社会生活。正如《主角》没有停留在主人公忆秦娥的个人生命体验中一样，《喜剧》同样没有聚焦在一位或几位艺人的生活和情感世界，而是通过喜剧这一艺术门类和丑角行当，容纳广阔的社会生活内容和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如此叙述，既有共情，又多了一份沉静和通透。作者既对其个体心理情感、生活命运热切关注，又在他们身上发掘更丰富的东西——人性、情感等，由此在社会现实、时代生活和心理结构、情感结构之间建立呼应和联系。

报仔